

(清) 俞廷举著

唐志敬

张汉宁

蒋钦挥点校

一園文集

张汉宁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⑥

一园文集

清·俞廷举 著

唐志敬 张汉宁 蒋钦挥 点校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总 序

潘 琦

全州人杰地灵，人文荟萃，在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的文人、学者和官宦名流。全州民风淳朴，全州人素以忠厚、耿直、友爱、礼让、敬业、勤劳的秉性受人赞许，所以往昔称其地有“燕赵之风”。全州在广西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，有较丰厚的文化积淀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自宋代以来，全州本地进士及第就有 143 人，举人 1570 人，这在广西数十县中是屈指可数的。昔时全州入仕者多以直臣、谏臣声名于世。明代理学名臣、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，监察御史曹学程，清雍乾年间以骨鲠忠直名世的御史谢济世，被誉为“粤西才子”的俞廷举，“铁面御史”赵炳麟等，都是些刚直不阿的人物。而在文坛，全州人则以和而不流、推陈出新为高标，其代表人物有清初“岭南词坛领袖”谢良琦，开一代画风的著名画家石涛，著名宫廷史学家蒋良骐等。他们的造诣为世人称道。全州历史上兴建了许多书院、学堂、寺庙、宗祠，当年的那些标志性建筑至今仍保留着恢宏、壮观的气度。民居多轩堂瓦舍，方砖铺地，马头高墙，一派江南风韵。漫游其地，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建筑的遗迹和在经济、文化发展中曾经拥有过的辉煌。

全州地处湘桂走廊北端，当中原岭南交通孔道，较早受湘楚

文化、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。启贤才、开风化、兴教育、办学校，得风气之先。自宋太守柳开创办柳山书院，便建立起一种陶冶高尚人格、培养独立学术思想的载体，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无怪乎元代诗人陆垕由衷地赞叹：“何年柳使君，开此读书林？天地三江远，烟云一径深。高山仰圣道，流水净人心。伊昔从游乐，遗风尚可寻。”元代柳宗鉴所著《清湘书院纪》也记述了当年全州办学的情况。这表明历史上的全州敷文重教，风气尤盛。柳宗元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解缙等文人墨客，都曾到过全州，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。

历史上的全州文人，相对而言勤于著述。史志存目作品有150多部，可惜或因兵火，或因灾变，或因代湮，大多散佚。如宋宝谟阁大学士陶崇《澈斋文集》、明工部右侍郎蒋曙《竹塘集》、明监察御史曹学程《忠谏录》等一批颇具文化、历史价值的著作已成绝版，留传至今的不过什一。而这一小部分古籍或为孤本，或为残本，其继毁续绝如悬一线，亟待整理抢救。

现代全州人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往情深，他们之中不乏有志之士，有才之人，对古今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研究见解。蒋钦挥、吕朝晖便是其中的两位。这些年来，他们本着对桑梓的热爱，利用业余时间，收集了大量全州的文史资料，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，已经撰写和正在撰写论文著作。近几年，由蒋钦挥首倡，有一批同道者携手协力，将全州历史名流的遗著搜集点校整理，编辑出版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，实为难能可贵。

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，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。要发展先进文化，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。离开传统文化，我们的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整理和抢救有价值的古籍，关乎固本拓源的宏旨，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致力于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整理

工作的同志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广西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文化遗存很多，包括文物古迹、民族民间艺术等文化遗产。要加强对这些资源的抢救、保护和合理利用，努力把广西的文化资源优势，变成文化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增长点。愿更多的同志投身于广西文化的研究事业和文化开发事业，创造丰硕成果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。

公元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六日

(作者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、宣传部长)

总序

熊显元 黄福喜

全州地为湘桂孔道，为南北文化交汇之区，山水人物具荆楚之俊逸，兼南粤之灵秀，在桂北乃至广西素有盛名。其文化底蕴之丰厚、民风之淳朴，我们早有耳闻。及调全州任职，与全州人民朝夕相处，一道工作和生活，对全州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全州历史悠久。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 221 年)，在县境内始设零陵县，属长沙郡；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 111 年)，设洮阳县；五代后晋天福四年(公元 939 年)，楚王马希范奏置全州，辖清湘、灌阳二县；元代升全州为路；明洪武元年(公元 1368 年)改府，旋降为州，二十七年(公元 1394 年)由原隶湖南永州府改隶广西桂林府；民初改称全县，1959 年改为全州县。

全州人文之盛，多集中在宋、明、清时代，尤其是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之前。其表现形式多以家族群体出现。如明代的蒋昇、蒋冕兄弟，前者为南京户部尚书，后者为首辅内阁大学士；陈瑶、陈琬堂兄弟，前者为金都御史，后为工部左侍郎；二陈的子侄辈陈邦偁、陈邦修，前者为礼部郎中，后者为太仆寺少卿；舒氏则有舒应龙、舒宏志父子，父为南京工部尚书，子为探花、翰林院编修。到了清初，则有“二谢”之称的常州通判谢良琦及曾侄孙、著名御史谢济世以及济世之叔、山东巡抚谢赐履；有

“一门四进士、三代三翰林”的才湾村蒋肇、蒋林、蒋良翊、蒋良骐；有连续十余代在朝为官的龙水蒋氏。综观他们，有的官至一品要员，有的被誉为粤西“词坛领袖”，他们各领风骚，留名青史。

俱往矣！全州的历史人物已成过去。但他们的道德文章、人品学问应该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，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，并在后人身上再现。今日的全州人，继承中有开拓，务实中有创新，粗犷中有细腻，文雅中有骨鲠，憨厚中有精明，豪爽中有约束。追根溯源，这些性格特点，应该说是先贤薪火相传的。

钦挥、朝晖等友人在邕搜集点校、整理十位先贤遗著，结集为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前人的著作，不仅是他们道德、学问的体现，也是当时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变迁的折射。相信读这套《丛书》，不仅对激励后者发奋读书、思有作为大有裨益，同时，也有益于我们以史为鉴，抓住机遇，把地方的事办得更好。

谨以数语为序！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（熊显元 中共全州县委书记）

（黄福喜 全州县县长）

向往全州(代序)

蒋子龙

数年前到广西的北海市参加一个活动，意外地结识了当时是《北海日报》总编辑的蒋钦挥。不知是因为同姓，还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我……

我因姓蒋，从小受另一个非常出名的蒋姓人牵累，有几个外号像影子一样，你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如“蒋委员长”、“蒋总裁”……我想钦挥也一样。虽然不会为姓蒋而自怨自馁，却容易在群体中感到孤单。故而见了同是姓蒋的人，从心里觉得亲近，在情感上希望姓蒋的能够更容易理解姓蒋的——这是那次广西之行的最大收获。

钦挥送我一本《全州蒋氏族谱》，里面讲到了蒋姓的起源，我如获至宝。在此之前，我对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一直懵懵不知。全州县有近80万人口，其中有18万人姓蒋。我自从上中学离开家乡沧州，在生活中就很少能碰上同姓的人。1995年去台湾，倒是遇见了不少改姓蒋的当地人。我当年刚学写作时则有人劝我起个笔名，借以避开名字前面的蒋字，被我拒绝了。理由有二：一、正因为姓蒋，已经被误会和调侃得够多了，越要“作”不改姓，“写”不更名；二、起笔名无非是求新求奇，我的名字一般，只因为前边有这个姓就有点稀少了，相信不会有重名。

从广西回来不久，正赶上中央电视台《百家姓》剧组为拍摄

蒋姓这集来天津采访我，他们还说刚去台湾采访了蒋纬国。如此看来，这个《百家姓》剧组成了解释中国姓氏的权威。我便先向他们请教蒋姓的来源。他们所讲，竟然完全印证了《全州蒋氏族谱》里的记载。我姓了半个多世纪的蒋，总算弄明白了这个蒋字，不能不感谢钦挥。

去年夏天我再去广西，走进钦挥的书房，见他的案头摆着高高的一摞古书，纸张陈旧变色，文字古奥难解，笔画残缺，模糊不清。他正在点校的是《赵柏岩集》，为晚清的著名御史、全州人赵炳麟所著。经打问，才知钦挥和他的几位同乡正在干一件大工程，自筹资金校订出版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。其中有明代嘉靖初年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的《湘皋集》，清初有岭南词坛领袖之称的谢良琦的《醉白堂诗文集》，著名画家石涛的《画语录》，山东巡抚谢赐履的《悦山堂诗集》，监察御史谢济世的《梅庄杂著》，四川营山、定水县令俞廷举的《一园文集》，融县训导蒋励常的《岳麓文集》，河道总督蒋启勋的《问梅轩诗草偶存》，顺天府尹蒋琦龄的《空青水碧斋诗文集》等等。

其中有因“持正不阿，直言敢谏”而被削职为民者；有“一生九年流放，四次被诬，三次坐牢，两次丢官，一次陪斩，履仁趋义而九死不悔”者；有主张“端正本，除粉饰，任贤能，开言路，恤民隐，整吏治……”者；有“脱于山川”、“法自我立”的天才横逸之士……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、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——我惊讶全州历史上竟有这么多鸿儒硕彦，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。同时更惊讶现代全州人，对全州的传统文化及先辈乡贤的尊崇。

恋乡情结，人皆有之，“月是故乡明”！但从钦挥身上体现出来的“全州性格”，令我感佩不已。整理出版先贤的遗著，就是对传统的文化道德最好的习得和承传。近百年来的多灾多难，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几乎砍断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

根脉。现在我们开始尝到苦头了，体验到了文化道德的尴尬——特别是道德，仿佛患上了世纪病。人们不能不意识到，必须再把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的根脉接上！

道德不能没有文化的培养和提升。世界上历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，目前让东西方学者都能接受的是美国学者克罗伯为文化下的定义。他认为文化构成了各群体的成就标志。也正是这个克罗伯还说过：“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，其中观念特别重要。”正是钦挥身上那种强烈的“全州文化观念”，深深打动了我。他的观念来自对全州文化传统的自豪，曾经创造了全州的历史和文化的群体，无疑是全州人成就的标志。

从钦挥等人所做的这件事上，可以看出全州先贤的遗韵。在全州，继承先贤的精神和文化是有传统的。清代的俞廷举，视“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，其功德当与哺弃儿、埋枯骨同”。一部人类文化史足以证实这种文化上的承传对一个地区、乃至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。人类曾经创造过灿烂异常的文化，皆因为不珍惜，不懂得承传，辉煌于一时，又绝迹于一瞬。如渊源古老的巴比伦文化，随着巴比伦国家的消失而夭折；盛极一时的玛雅文化，其天文、数学上的成就无与伦比，也早已消亡；还有已经伊斯兰化的埃及文化、雅利人创造的印度婆罗门文化，都已面目全非，今非昔比了。

所幸，全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住了自己的文化精髓，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，也跟全州人的性格有关。或许正是全州人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全州人的性格。他们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八个字：刚正拙硬，重信重诺。

去年秋，我和钦挥乘车在从宜州赶往桂林途中，发现刚修好的高速公路因农民设路障而阻断。在当今中国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，许多人早已见怪不怪，各种车辆都驶离公路向远处绕去。钦挥作为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心使他在车上坐不住了，很想去问个究

竟。他不敢说这么大的国家里会没有刁民，但是，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截断高速公路，必有一定缘由。可他分身无术，我们又要赶时间，他只好给当地记者站打电话，指派一名记者立即来现场调查，到晚上他还要再跟记者通电话，商量怎么办。

他离开报社不过两三天，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上街买一份他任总编的《南国早报》，从头到尾浏览一遍，然后才能再去干其他的事情。他是学新闻的，编报是他的专业，直面现实，披坚执锐，求真求深；余暇则喜欢沉浸于历史文化之中，衡人论文，倍多谨慎，磨砺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品格。

他是现实的，又是历史的。唯其热爱现实，就更需要历史。历史是过去的现实，现实是明天的历史。无论是对待现实还是对待历史，他的执著、强韧和一丝不苟是一贯的。这就是全州人。

我没有去过全州，但通过钦挥似乎认识了全州。全州可以为它的过去自豪，也可以为它的现在自豪——真是“人杰地灵”啊！

公元二〇〇一年七月 于天津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天津作家协会主席）

都庞铸魂兮湘水作魄

——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序

袁鼎生

全州，东西有都庞、越城二岭列屏，南北有湘江纳罗水、灌江、建江作带，自古俊彦辈出，慷慨通脱，神融湘风桂韵，胸纳山魂水魄。明代的蒋昇、蒋冕、陈瑶、陈琬、蒋曙、曹学程等，清代的谢良琦、谢赐履、谢济世、俞廷举、蒋励常、蒋啟敷、蒋琦龄、赵炳麟等，更是学究天人，识通古今。上述诸君，笔引湘水，化作纸上波澜；墨凝烟霞，写尽人间悲欢，提升和弘扬了全州的人文。而全州的人文，又铸就了他们卓尔不凡、超尘脱俗的道德文章。

全州的人文精神，是一种刚性精神，是雅正刚直与拙硬顽强的统一。它基于重信重诺、重情重礼的乡风邑俗；基于疾恶如仇、急公好义、乐善好施、吃硬不吃软的地域文化心理。

“蛮”与“硬”，至今还被他乡人士用来概括全州人的普遍风貌。这不乏褒贬共存、优劣共处。就褒意说，这当是一种“原汁原味”的进取性、攻坚性、韧性、正直性人格；就贬意讲，它又似乎成了不知灵活、不讲变通、不讲忍耐、不讲策略的代名词。“正”与“刚”，则表征了全州文化人的风神，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，有着追求真理、匡扶正义，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刚烈性、悲壮性与崇高性。蒋冕、曹学程、谢济世、赵炳麟等人实践了这种精神。翻

开钦挥君的《此公至今原不死》，就可领略到他们的侠骨忠肠，松风竹仪，莲神梅韵。实际上，这“正”与“刚”，是“蛮”与“硬”孕育的，没有后者贯注其中，前者当缺乏力度，缺乏支撑。就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。“正”与“刚”的雅文化人格，要以“蛮”与“硬”的俗文化人格为基础。离开“蛮”与“硬”，或轻视、鄙视“蛮”与“硬”，妄谈全州文化人的“正”与“刚”，当无法谈到根上。

全州文化的成因，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。翠被湘桂的巨岭，铸就了全州人文精神的骨架；滚滚北流的大河，开阔了全州文化的襟怀；而喜酒嗜辣的生活习性，为全州文化渗入刚烈、豪爽与任气由性。正是这稳定的文化背景，使全州的文化特征历久而不变味，正是这深牢的文化根基，使少小离家的全州人，天性不改鬓毛衰，一口纯正的乡音，一副正宗的全州人作派，虽身处异国他乡，混迹茫茫人海，均能很快地相识、相通、相融，相敬、相帮、相助，共生、共荣、共进。

“正”与“刚”的全州雅文化层面，与屈原代表的“虽九死而未悔”、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楚文化，有着地域的关联，历史的传承，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重大义、重气节、重人格的精华更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。可以说，全州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楚文化所范塑，全州文化以其鲜明突出的个别性，体现了甚或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。正凭此，全州文化有着相当高雅、典雅的品格，而整理、出版全州文化精华，也就有了充实、丰盈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全局性意义。这也是编辑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、必要性所在。

我参与这套书的编写工作，也与浓浓的乡情相关联。我和钦挥七十年代末在桂林见过一面，以后虽偶有联系，但近二十年未能再次相见。1999年，他当时在北海任职，我和祖斌弟出差钦

州，专程赴北海去看望他。班荆道故，重逢恨晚。此前，我拜读了他惠赠的描述全州历史人物的大作，话题很快转到全州文化上面来了。在风光宜人的北海银滩，踏着软软的白沙，瞩目滚滚碧波，他告诉我，想编写一套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，并热情邀我参与这一盛事，我欣然同意。此后不久，他列出了书目与编撰点校出版计划。我虽有热爱家乡文化的拳拳之心，但缺乏研究，拟就此机会，熟悉“家底”，也就协助他做些事，开始投身这项只有义务而没有个人实际功利性的系统工程。

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，做这样一件只有“知识”而无“经济”的事，一方面是出自报答父老乡亲物质上、精神上的养育之恩，另一方面是为了促使全州“蛮”与“硬”的俗文化层面，向“正”与“刚”雅文化层面升华，再一方面是为了发掘家乡优秀的文化遗产，以丰富、发展祖国优秀的文化，促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。

读书人总得做点读书人的事，这是钦挥邀我和朝晖、光哲诸同仁从事这项工作的共同心理基础。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先生们出版这套不赚钱的书，也基于选择、积累、传承优秀文化的目的，我想全州八十万父老乡亲当会感谢他们。

二〇〇〇年六月三十日

于桂林叠彩山面壁斋

写在《丛书》出版之前

蒋钦挥

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即将付印之际，光哲兄要我谈谈为何要整理出版这套《丛书》。我作为策划和参与点校者之一，也有责任向读者说说我们的一些想法。

(一)

我们整理这套《丛书》的初衷，首先应该是受这些乡贤身上的某种精神激励、感召。1998年1月，我在拙作《此公至今原不死——全州历史人物传》的前言中，曾谈到过这个问题。

至今在我看来，发生在明代嘉靖初年的那场“大礼”之争，是一场无关国家宏旨的皇家私事。但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，遵循传统的理学观点，明知前任首辅杨廷和因议大礼而得罪皇帝被罢免，仍要固执己见，不看嘉靖皇帝的眼色办事，不屈不挠，持正不阿，直言敢谏，甚至抱定“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”的观点，最后只好辞职还乡，三年之后还被削职为民。

清雍正、乾隆年间的名御史谢济世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先因弹劾酷吏、河南巡抚田文镜，得罪了雍正皇帝，被充军到阿尔泰军营；又为注书差点掉了脑袋；复职后担任湖南粮道，面对顶头上司织成的庇护网，敢于为民请命，揭发贪官污吏，以致自己反被诬陷。直到乾隆皇帝亲自过问，一场轰动湖南全

省乃至京城的冤假错案，才得以平反。他一生九年流放，四次被诬，三次坐牢，两次丢官，一次陪斩，履仁趋义而九死不悔，历尽劫难却意志弥坚。

作为七品县令的俞廷举，勤政爱民，独持清操，在不见容于权要时，是得罪上司还是得罪百姓？他效白居易“宁为百炼钢，不为绕指柔”，宁可辞官不做，也不愿得罪百姓。

晚清三大名御史之一的赵炳麟，尽管他父亲谆谆告诫他：“审时势，酌进退；谦交君子而不可流于党，善避小人而不可结为仇；谨言语不可说他人之短，惜笔墨不可书时事之非。”但是，他面对当朝最大的小人——炙手可热、权倾一时的袁世凯、奕劻，明知言出祸随，仍抱一腔报国热血，敢于虎口拔须，一再弹劾……

是一种什么精神，使他们不顾个人前途、甚至身家性命，敢于在谄谀之中发出谔谔之音？从表象看，是他们性格太过方正刚直，不善圆滑，不能容人，也不为人所容，以致宦途颠跻相接。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则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理想、信念在鼓励他们，是中国文人所提倡的气节在鞭策他们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驱使他们。所以，他们“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”，或议论朝政得失，或直攻帝王的昏聩，或怒斥宦官的专权，或揭露官吏的贪婪，或痛骂奸臣的误国，或鞭挞朋党的倾轧……不同程度地表现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。显然，这种抗争不同一般的意气之争，而是在争一种骨气，一种正气，一种气节。应该说，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不死。

(二)

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对中华民族来说，一部近代史可谓是一部充满痛苦、耻辱和灾难的历史。自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

以至宣统，外辱内患，连年不断，大清帝国急剧走向崩溃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《丛书》中的两位作者蒋琦龄和赵炳麟，恰恰生逢其时。他们的诗文咏事纪实，皆其亲见、亲历、亲闻，把当时奸相的专权，官场的倾轧，言路的塞阻，苛捐杂税的繁重，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及列强的虎视眈眈，民族的危机和忧患，都写了出来，弥足珍贵。

“气愤如山死不平。”面对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，已离任了的顺天府府尹蒋琦龄，以不胜愤懑之忱，在他著名的《中兴十二策》中，提出了“端正本，除粉饰，任贤能，开言路，恤民隐，整吏治，筹军实，诘戎行，慎名器，恤旗仆，挽颓风，崇正学”的政治主张，喊出“民为邦本，人心未去，即天命长留”的心声。

“报国文章皆热泪。”赵炳麟留给后人的著述颇为丰富，尤其是他的光绪、宣统大事汇鉴，最值得一读。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是饱蘸血泪来完成的。以至近百年以后的今天，当我们读到国势衰弱、八国联军入侵，贵为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仓皇出逃，沦落到手捧青豆而食，借百姓被褥而宿，以扫帚当枕头的窘境时，悲愤之余，而不能不领悟到“弱国无外交”、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硬道理；读到一些封疆大吏平日夸夸其谈，一旦朝廷有事则望风而逃、寡廉鲜耻时，我们不能不为清王朝的吏治腐败而拍案而起；读到那些忠勇之臣或民间义士，大敌当前，奋勇当先，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时，又不能不为之肃然生敬，乃至热血上涌，热泪盈眶……

因此，从不忘国耻的角度，把蒋琦龄、赵炳麟著作的史实部分，视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，实不为过。

(三)

当然，《丛书》中的作者，由于各自的经历、所处的社会地